

苦难中的温暖与淳朴乡土的嬗变

——论马金莲的小说创作

乔宏智

内容提要： 马金莲是回族“80后”作家。她通过中、短篇小说创作，构造了一个原生态的回民乡土世界。她借用独特的艺术手法，在为我们传递苦难中温暖的同时，表达了对在现代化进程中乡土世界嬗变的思考。

关键词： 叙事策略 主题内蕴 艺术特色

宁夏回族作家马金莲用她笔下独特的文字世界为当代文学注入了一丝清恬的乡土气息。从代际划分的角度看，马金莲属于“80后”作家，但她的小说创作能够远离商业市场，紧紧扎根于大地，从回民的日常伦理出发，落脚到具有普世价值的人间的光辉与温暖，用宁静、深情的笔触缓缓流淌出一个淳朴、善良的新世纪乡土世界。马金莲的小说创作主要以中短篇为主。从主题来看，大都选取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人或事，如《糜子》《春风》《老两口》《碎媳妇》等。语言风格上朴实、细腻，充满乡土气息，情节安排上也介乎散文抒情和小说叙事之间，不靠跌宕起伏的故事性取胜。然而马金莲的小说并不似白开水般索然无味，却如五味瓶一样内蕴着种种生存的艰辛和生命的美好。马金莲通过对生命苦难的真实呈现以及对人性中善的因素的讴歌，如一泓清泉涤荡了我们历久蒙尘的心灵，留给我们的是深沉的爱与感动。

双重叙事与坚韧的小说品格

马金莲的小说虽然采用的是一种日常化的甚至是带有底层色彩的叙事方式，篇幅也限于中短篇小说，但她的小说却内蕴着丰厚的情感和深层的主题。小说的语言虽然是娓娓道来般的略微口语化的讲述，却通过细腻、准确的心理分析和翔实的细节描写将人类最朴素的感情呈现得淋漓尽致。小说在叙事上大多采用一明一暗两条线索、两个层级，有时甚至是完全矛盾的叙事，从而使得文字表面的情感与文字背后的情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互补，在不经

意的文字表达背后蕴含着极具张力的暗涌,从而造就了小说丰富的主题内蕴和坚韧的小说品格。且这种双重的叙事不仅仅局限于某一篇文章,而是在马金莲执着、统一的文字世界里具备了整体性的文学互补。马金莲的小说并不零散,反而具有坚实的基础。对苦难的描写与呈现是马金莲小说中一个重要的面向,但在文字表面对苦难呈现的同时,更有着对抗苦难的顽强与对抗苦难的人们的大爱与善良。下面我们就结合具体的文本对马金莲小说中的这种叙事张力和深层内蕴进行分析。

对贫穷的生活和饥饿的描写在马金莲的小说里是经常看到的。马金莲的小说世界是牢牢扎根在宁夏西吉,即小说中的扇子湾——这一片回民乡村生活的土地之上的。这是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依靠土地和天气为生的世界,这也是一片有着旺盛的生育能力的世界,这同时又是一片遵循着穆斯林传统和古老自然法则的地域。从现代性的观点来看,原始的农耕文明在较好地保留传统文明的同时,也是一种落后的象征。在人多、地贫、生产力水平有限的经济条件下,贫穷与饥饿便往往成为困扰人们生存的最主要因素。在小说《糜子》里,全家的口粮都寄托在那一片糜子地上,眼看一年的好庄稼就差最后的收割了,一场冰雹过后,爷爷只得“拿走了家里最长的一根棍,最旧的一条毛线口袋。……从一户讨要到另一户,从这个庄子转悠到下一个庄子。讨要够一家子一冬的口粮他才有脸面回来”^①。可是,赶上大灾之年,即便要饭,也未必顺利。对于出门讨饭的老人、孩童来说,除去恶劣天气和饥饿的肉体外,“人的肚子饿,游狗们更是饥肠辘辘,……她的右腿被狗咬了,一个窟窿张着,像娃娃的口,结痂的血痕黑糊糊的,新鲜血液从里头不断往外渗,连老棉裤也渗透了,湿沥沥、黏糊糊的”^②。不仅仅是大人挨饿,正在长身体的娃娃们更是饥饿难耐。《柳叶哨》里的小女孩“梅梅”一边遭受着继母的虐待,一边还要看护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连妹妹的口粮都不够,更何况对她。对“梅梅”来讲,“活着就一个愿望,早一点喝上今天的面汤汤”^③。集体劳作的时代,春耕时节,不仅仅是牛乏驴困,在地里撒种的女人,宁肯吃被尿搅拌过的种子,她们“饥饿的大口,简直要把盛粮食的木升子吞下去”^④。与饥饿相伴相生的是极度的物质匮乏,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之前,无数的人家“如水洗了一样的贫困”^⑤,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长河》里村庄中最老实厚道的人“伊哈”上有老父母,下有三个娃,“最值钱的家产可能就只有土院子里的一间土房子,一眼窑洞,除此之外你找不出更值钱的来”^⑥。按照伊斯兰的习俗,人去世之后要用新

① 马金莲:《糜子》,《父亲的雪》,银川:阳光出版社,2010年,第139页。

② 马金莲:《山歌儿》,《碎媳妇》,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5页。

③ 马金莲:《柳叶哨》,《碎媳妇》,第101页。

④ 马金莲:《父亲的雪》,《父亲的雪》,第1页。

⑤ 马金莲:《山歌儿》,《碎媳妇》,第116页。

⑥ 马金莲:《长河》,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764acd80101gbxf.html。

的羊毛毡子将尸体包裹,可是“伊哈”家不要说新的羊毛毡子了,就连旧的都没有。

马金莲笔下的贫穷与饥饿,与政治无关,更不在于控诉,面对苦难,人们仍然通过辛勤的劳动,通过邻里的互相帮助,顽强地生存下去。《永远的农事》中开篇便是“人难活,屎难吃,苦难下。”^①这样一句话,文中介绍了拉粪、扬粪、摆耩、锄草、犁地、打胡基、种胡麻、除糜子、收小麦等等各种各样的农活,在叙述的字里行间,庄稼人的勤劳和对土地的感情呈现在读者眼前——“我们的一生都与这种叫做庄稼的东西有关,是深深的难以割舍的关联。这种关联是深入血脉、骨肉相连的……轻视庄稼的人就是忘本的人。”^②将土地当作生存的根本,无论年景如何,都一点也不懈怠,用一种近乎虔诚的心去劳动,这种坚持与朴实是在任何生产力下都不可或缺的劳动精神和生存信念。《柳叶哨》里的“梅梅”在饥饿到生存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得到了隔壁邻居男孩“马仁”的饼子,在不富裕的年景里,“马仁”是省下了自己口里的粮食帮助“梅梅”度过难关的。面对来之不易的饼子,面对后母的虐待,“梅梅”依然与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进行分享,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人性中简单却又伟大的怜悯之心与和衷共济的精神。马金莲笔下的贫穷与饥饿受制于客观的生产力条件,作者却将这种苦难消解于人性的光辉和人间的大爱之中。

或许是受到女性意识的影响,马金莲小说世界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便是男性的缺席。这种缺席往往是由男性的死亡或者常年外出导致的。《五月散记》中的“四奶”“年纪轻轻儿的就毁了男人,把撒下的六个娃娃,苦心苦意拉扯大了,却都那么无常了”^③。丈夫与儿子先后缺席,只剩下孑然一身、默默承受苦难的女性。《碎媳妇》中的新媳妇“雪花”,婚后不久丈夫就去了县城的工地打工,不要说相见,偶尔打来的电话也只有婆婆才能接。在家里与嫂子、婆婆关系的处理,包括因没有儿子受到的村里人的嘲讽,都要女性一人来承担。马金莲笔下的妇女形象面对男性的缺席,用女性特有的隐忍与坚强撑起了家,撑起了岁月的重担。从今天女权主义的角度看,对女性的不尊重与压迫是有违人性的,而在当时的历史时空中考量,却也正是这种伟大的女性光辉延续了家族的生存,女性的牺牲精神在今天看来依然是伟大与令人心痛的。

传统乡土世界遭遇的冲击与嬗变

苦难在马金莲的小说世界里有着各异的面貌,而生存的艰辛也恰恰是现实生活中最本真的底色。但在苦难的文字背后,又隐含着同样的一种向上的正能量,二者在碰撞、对抗,在

① 马金莲:《永远的农事》,《父亲的雪》,第82页。

② 马金莲:《蝴蝶瓦片》,《碎媳妇》,第51页。

③ 马金莲:《五月散记》,《父亲的雪》,第328页。

互相撕裂与消解,作者通过这种双重意味的叙事,丰富了语言的张力,使其小说世界具有了深层思想意蕴的美学特质。通过对马金莲小说的阅读,不难发现,其小说给人最初的感受是感动与温暖,但没有阅读过后的思考便难以体会出小说内在的这种刚烈的精神。究其原因,便在于马金莲对传统乡土世界遭遇的多元、深层、回归历史和大地思考。

虽然马金莲笔下的乡土世界有着各种各样的苦难,但总体而言,马金莲笔下所塑造的是一片洁净的、淳朴的、有着传统的道德坚守的土地。然而,随着不可避免的现代化进程,传统的乡土世界刮入了一场不一样的风暴。从金钱的诱感到传统风俗的丧失,现代化和城镇化过程中的乡村实实在在地经历着一场异质性的文化和价值观的冲击,并在不断的失落与坚守中悄然发生着嬗变。马金莲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现象,并在小说中进行了表现。一方面,是物质诱惑下亲情的变质。《舍舍》中的“舍舍”是“黑娃”的妻子,小两口共同劳动,一起养育还在吃奶的孩子。谁知丈夫“黑娃”在一次骑摩托车进城买农药的时候发生意外,不幸遭遇车祸死去,换来了十六万五千元赔偿。生命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照常理,这笔赔偿款理应是“舍舍”和孩子继续活下去的希望,结果反而成为了“舍舍”新的苦难的源泉。当赔偿款来到的时候,家人们没有沉浸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而是任由内心的贪欲面目狰狞地张开了血盆大口。结果“舍舍”的娘家和婆家为了争这笔钱大打出手,都想独自占有这笔“不菲”的财富。没有人考虑“舍舍”和孩子的未来。“舍舍”面对怀抱里还在吃奶的孩子,选择了放弃金钱,留在婆家养育儿子。故事似乎以“舍舍”的母爱无私的付出为结局。我们本以为会看到希望,看到以“舍舍”为代表的对乡土伦理的坚守,然而小说却突然转向,“只是,有一天,舍舍走了。扔下儿子,悄悄出了马家门,没有带走马家的一根针,一棵草……后来,有人在新疆见过舍舍……叫人惊奇的是,她不是过去那个舍舍了,她摘了帽子,取下盖头,把头发烫成卷儿,波浪一样披着”^①。《舍舍》中“舍舍”形象最后的转变是耐人寻味的。金钱诱惑下父母与子女间最亲的骨肉之情都烟消云散,“舍舍”最初的坚守本是一种对诱惑的抵抗,但结局依然是令人扼腕的。“舍舍”是乡土世界里的年轻人,代表着对生命和传统的延续,也曾是小说中对亲情坚守的代表,她的变化,足以显示物质的冲击波力量之诡异。另一方面,是现代文明对传统乡村生活方式与精神认知的断裂。传统的乡土世界是一片相对封闭的近似自给自足的天地,马金莲笔下传统的农民大多是没怎么受过现代学校教育的,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信念是延续祖辈父辈的一种经验式的生存,内心里也保有着深厚的乡土情结和乡土意识。然而随着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的青年人走出了闭塞的天地,掌握了科学知识,对现代化带来的都市景观惊诧不已,这种新鲜的、异质性的现代化因素逐渐将其骨子里根深蒂固的乡土意识中的依恋心理

^① 马金莲:《舍舍》,《碎媳妇》,第 170 页。

打破,这一类人似乎难以再回到现在看来是较为落后的乡村生活中。对乡土来说,这是某种程度上的一种丧失,作为乡土新鲜血液的年轻生命,能否在接受了现代化带来的文明和科学之后,依然能够扎根大地,保持对乡土的联系,甚至回到父老乡亲的身边来帮助建设,马金莲对此进行了无奈的拷问。显然,长此以往,过不了几代人,整个乡土就会在现代化的风暴中一点点被掩埋。而且这种现代文明的冲击将会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乡村也会在这种痛苦的嬗变之后变得面目全非。再一方面,是现代化过程中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对乡土世界人们的精神腐蚀。在生产力低下、大家共同贫困甚至是吃不饱饭的年月里,往往人心还是善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融洽的,社会风气还是清明的。现代性带来了生产力的进步,人们的物质得到了富足,人心的善恶取向反而逐渐走了下坡路方向。《庄风》里的红土湾就是这样一片坏了风气的地方。年轻人们不但脱离了土地的生产,荒废着土地,选择到城镇打工,而且还将辛苦挣来的为数不多的血汗钱用来赌博。随着读书的人多了,出去打工的年轻人也多了,可是庄风却未见好转,外出的人们带来的是赌博的新玩法和传统精神信仰的缺失。世世代代的农人所遵守的脚踏实地、勤劳、善良的美好品质丢失了,好吃懒做、渴望不劳而获的懒惰心理却是快速蔓延。享乐和消费替代了年轻人传统的民族信念。柯家甚至还出现了在外卖淫的女子,用出卖灵魂来换取肉体的享乐,甚至不惜违背数千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信仰。尽管各种各样背离传统的荒诞事发生了,可人们的生活依然在继续,“红土湾的庄风还是那个样,不好,却没坏到哪儿去”^①。发展滞后于城市的乡土世界都难以逃脱现代化带来的消费主义、道德沦丧等负面因素的影响,更何况城市中呢?在城市意识到错误,开始反思的时候,乡村还能否有人帮助她,重新找回那颗没有蒙尘的心灵?

现代化过程中人们精神的颓废在城市里较早出现并迅速蔓延,早已成为我们的共识。但乡村也开始出现这种现代化的病症是值得我们警醒的。马金莲在塑造传统乡村的同时,意识到了这种乡村遭遇的新的冲击与嬗变,这也是马金莲小说独特的价值之一。

类型化的人物形象与多重叙事技巧

马金莲的小说创作目前来看主要以中短篇为主,在思想意蕴上也紧紧围绕着回民乡土世界进行思索、呈现,整体上形成了小说创作较为一致、鲜明的风格。其小说在对上文中提到的呈现苦难、传递温暖、思考乡村现代化冲击下的嬗变等进行创作的同时,塑造类型化的人物形象和运用独特的叙述技巧是其小说创作的两大重要工具。借助这两种途径,马金莲将丰富的主题内蕴在一种统一的艺术风格下传达了出来。

^① 马金莲:《庄风》,《父亲的雪》,第303页。

对于小说来讲,人物是支撑小说的主要框架之一,同时也是解读小说内蕴的钥匙。马金莲的小说里主要有两类人物形象:一类是残缺人物,一类是女性人物。对残缺人物的描写是马金莲小说中一种重要的叙事向度,关注残缺人物本身就体现了一种爱与关怀,同时这样一群残缺人物的存在也是客观存在于乡土世界中,构成了乡土文学世界里重要的一极风景。毫无疑问,无论是天生的生理缺陷还是后天意外伤害造成的创伤,对于残缺者本人和他的家人来说,带来的只有痛苦、绝望的体验。《长河》中有着浅浅酒窝的可爱姑娘“素福叶”却有着先天性的心脏病,在年仅 12 岁的童年时代便离开了这个世界。《细瓷》中二爷二奶的女儿“牡丹”和《瓦罐里的星斗》中的男孩“克里木”同为智障患者,只要他们活着一天,家里人就要照顾他们一天,而且,他们的死亡会引发家里人巨大的伤痛。《少年》中“哈三、哈塞”两兄弟的父母都是哑巴,外出打工的他们甚至连给家里打一个电话的机会都没有,因为家里没有人能够说话、接电话。《蝴蝶瓦片》中“刀子老汉”的双腿残疾的儿子“小刀”因为常年瘫痪在床无法出门,以至于村子里的大人小孩们都忘记了他的存在。马金莲塑造这样一群残缺人物的目的不仅仅是呈现苦难,而是更深层次地表达出了残缺人物身上多种的美好品质和通过他们体现出来的爱与坚强。《长河》中的“素福叶”尽管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但她带走的和留下的都是美好与温暖;《细瓷》中的傻子“牡丹”,尽管“我”失手打碎了她心爱的细瓷盘,尽管她的母亲“二奶”借口与我们家里发生了冲突并导致了我們不得不搬家的结果,但临走之时“牡丹”却将她挚爱的一片光滑的细瓷碎片送给了“我”;《春风》中的傻子“存女”不仅有自己父亲的关爱,更有瞎子“黑进宝”对她真挚、纯洁的感情;《瓦罐里的星斗》中傻子“克里木”,全家人都抛弃了他,母亲却一直不离不弃养育着他,他的心里也非常清楚自己带给母亲的痛苦,而他在自己童话般想象中的死去也仿佛是儿子带给母亲的一丝解脱;《蝴蝶瓦片》中的“小刀”虽瘫痪在床,却做出了一双双连女子都做不出的布鞋,在得到了村里人赞赏的同时,感到自己不再是毫无用处的人。马金莲笔下的残缺人物的独特性便在于此,既不是毫无用处,也不是完整的人;既不是为了单纯表现亢奋的生命不屈,也不意在唤起人们对这样一批人物的同情,而是在作者一抑一扬的情感叙述中超越了生理的残疾,获得了某种更高层次的完整。

马金莲小说中的另一类形象便是乡土世界中的回民女子形象。女性形象在乡土小说中非常丰富,然而“五四新文学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所想象、建构的女性形象经常被描绘成各种压迫势力的受害者。女性形象叙事经常被简化并纳入思想启蒙、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这样的宏大话语之中”^①。马金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与启蒙等革命话语无关,而是从小女孩到老奶

^① 张丽军:《乡土中国现代性的文学想象——现代作家的农民观与农民形象嬗变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年,第 267 页。

奶一系列回族农民女性的典型形象,这也是马金莲小说女性形象的独特之处,她们身上承载着的是一个民族的女性记忆。老年女子的形象如《窑年记事》中的奶奶、《五月散记》中的四奶和《风痕》中的哑奶等,她们大多是家庭中的家长,一辈子辛勤劳作,往往也都是与苦难一起走过了大半的年月。她们精通农业生产,与生活艰辛顽强抗争,并有相当一部分年老了落得孤苦伶仃,或是依然要照顾后辈子孙。她们年轻时较多受到封建宗法制的影响,并继续将这种家长权威传递到儿媳妇的身上。而小说中年轻女子的形象则可以统称为“碎媳妇”,如《碎媳妇》中的“雪花”,《搬迁点的女人》中“小王的女人”和《掌灯猴》中“程丰年的女人”等。对她们而言,婚姻的意义不是爱情和幸福,更多的是对男人一家老小生活的负担,既要辛苦地承担起家里大部分的农活,还要学会在与婆婆和妯娌们之间复杂的亲戚关系中找到生存之道。她们一生的生活轨迹似乎已然定格,唯一的改变往往是不幸意外的到来。马金莲小说中还有很多小女孩的形象,她们在小说里多数情况下都被称为“赛麦”,如《糜子》中的“赛麦”,《六月开花》中的“赛麦”,《赛麦的院子》和《墨斗》中的“赛麦”等。她们很小就要帮助家里的大人进行农业生产,尽管时常吃不饱肚子,但从自然中获取的乐趣丰富了她们的童年。马金莲塑造女性形象的目的是以她们为代表,来呈现整个回乡的女性。结合上文谈到的男性缺席的情况,女性的生活和命运往往更接近于日常生活下扇子湾人们生活的本真。与此同时,正如别林斯基说的:“对于一个要想在自己作品中描写人民的精神面貌的诗人来说,只有当他的天性、他的心灵是与所描写的那个民族的民族性有活生生的血肉联系时,他才能从研究那个民族的历史中得到益处。”^①同样是碎媳妇中一员的作者,更能理解她们,也更可以通过她们表达内心的情感。

马金莲小说中另一个重要的艺术技巧是独特的叙事。她的小说中最大的叙事特色便是一种日常化的叙事。对回民日常生活进行书写,并在其中浸润着浓浓的回族的风土人情。从小说中的语言,如“碎媳妇”、“尕师兄”,到回族特有的风俗习惯,如“念苏热”、“散海底耶”,回民日常生活的书写构筑了马金莲小说独特的民族化品格。这种民族化的表达并非马金莲刻意为之,这样的表达与思维早已浸润到作者的血液里,只需要随着情感便不自觉地流露出来了。况且这样的叙事风格,家乡人读来,倍感亲切;异乡人读来,新奇别致。其构成了马金莲小说独特的表达特质。另外,借小女孩的叙述视角来观察世界是她小说另一个重要的叙事策略。如《赛麦的院子》《糜子》和《墨斗》中的“赛麦”,《父亲的雪》中五岁的“阿舍”和《早年的收藏》中的“芒女”等等。通过孩子的眼来看世界,虽然是限制性的叙述视角,但由于孩子们天真烂漫、不谙世事的特性,能够将许多诗意的语言借孩子的口吻表达出来,从而淡化了故事表

① [苏]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梁真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第87页。

层的苦难。例如《长河》中提到的家里有了亡人后办丧事时要“散海底耶”，即给来参加丧事的孩子们发少许零钱。这样一来本来悲伤的告别在孩子眼里反而有了节日的意味。父亲“伊哈”的离世对家里最小的孩子来讲似乎没有什么，因为他们还无法完全明白死亡意味着什么，这样一来，童年叙述视角的运用，既利于营构小说的诗意氛围，同时也便于作者将自身童年的经验在小说中进行表达。

马金莲在小说叙述过程中常常采用并叙、插叙等多种叙述手法，将多个事件同时进行讲述，既实现了故事时空的跳跃，又不至于让一个悲惨的基调贯穿全文。例如《醉春烟》^①一文中，开篇是奶奶与正给儿子理发的媳妇的闲谈。继而转向男孩子理过发后去往“猫爷儿”家看捏泥人。晚上男孩儿陪丈夫不在家的新媳妇过夜，故事又转到新媳妇身上。与此同时的夜里，通过母亲的回忆叙事，又将公公和丈夫的故事铺展开来。就这样，多线索的组合叙事最终落脚到一个核心的主题上去呈现。此种表达方式虽然略显零散，客观上却造就了文章原生态的风貌，毕竟现实的生活远比小说里的故事要零散的多。

马金莲在创作谈中写道：“文字营造的世界是温暖的，是矛盾的，当然，也难以避免生活中那些必须面对的残酷和冰冷”^②；“在时间的长河里，我们生命的个体就是一粒粒微小的尘埃。我想做的是，通过书写，挖掘出这些尘埃在消失瞬间闪现出的光辉。”^③马金莲用她实实在在的小说创作，既温暖了我们的世道人心，又为我们展现了作为年轻的“80后”作家对土地、对道德人心的关注和思考。尽管马金莲的创作还应该多多关注当下乡土的生活，尽管她对乡土生活的呈现还应该更多地走出日常叙事更加深入精神世界，尽管马金莲应该更多地展现“80后”这一代农民的爱与痛，并更多地让我们感受作者自己的生命体验，但我们需要感谢马金莲，是她为我们在喧嚣扰攘的物质化快节奏生活里保留了那一方净土，让我们再一次贴近大地，重温文字的美好与文学的温暖。

（乔宏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周翔】

① 马金莲：《醉春烟》，《创作与评论》2013年11月号。

② 马金莲：《涂抹小说的缘由》，http://blog.sina.com.cn/s/blog_6b0576ed010190m5.html。

③ 马金莲：《在时间的长河里——〈长河〉创作谈》，http://blog.sina.com.cn/s/blog_9764acd80101ge9p.html。